

■人物素描

钟伟:坚守独立研究就得忍受孤寂

□刘晓阳

钟伟是那种总能在别人热议的话题里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学者。前一阵围绕股市泡沫的争论,钟伟又一次站到了中间立场,提示研究者与媒体对经济问题下结论,一定要有证据。

这话听来不像经济学家,倒有几分像律师。而这正是像钟伟的做事风格,尽可能做到研究风格独立,说话更接近真实。

从事经济研究,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

因为对房地产的研判触及到了社会深层矛盾与不同利益者神经,去年,钟伟一再被推倒聚光灯下,纠缠在数不清的口水漩涡里。

2006年2月,钟伟那篇《房产暴利是权钱合谋下对农民的掠夺》痛快淋漓地批评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垄断与寻租,“房地产暴利链条的中间环节满布密麻麻分利益的蟑螂;而在链条的两端,分别是购房者和被征地的农民。”赢得一片叫好声。

事隔不久,在政府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中,钟伟却突然又发表一篇《中国房地产极大地增强了国民幸福感》,说中国房地产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最佳范例。虽然文章有逻辑和数据作支撑,但媒体和网民还是一起对他口诛笔伐,甚至被讥讽为“变色龙经济学家”。

在遭受了疾风暴雨似的网络板砖之后,钟伟逆风而上写了《经济学家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认为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求真务实是第一要务,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考虑之列。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经济学家道德的大讨论。

这就是钟伟,经常对该说和不该说的话,只要他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有价值,就会不吝笔墨去写去说。

他也许在实现自己定下的目标,每年都要和另外几位博士一起发表独立的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尽可能地以学者的眼光去看经济。这也是他在房地产问题上屡受争议的个人原因。

2005年研究金融的钟伟开始关注房地产,应该说那也是按照博鳌房地产论坛要求去做一个主题演讲《外资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规模和影响估测》。钟伟的演讲一向被认为非常乏味,因为他声音比较轻,坐在后排的人听不清楚,而且没什么表情,也不慷慨激昂。但是在旁人看来,钟伟这次语出惊人。

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演讲中,钟伟用数字阐述了他关于外资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影响的分析。他的结论



是: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才刚刚开始,如果中国房地产行业有泡沫的话,怨不得别人,咱们自作自受。很快不少人开始责难,认为这是在替外资进入中国房地产作辩护,钟伟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尊重数据和逻辑。”

而在2006年的博鳌房地产论坛上,钟伟又一次关注房地产,演讲的题目是《泡沫的代价》,他再次使举座皆惊:“如果房价12个月内下跌30%,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飙升到1.02万亿元,银行的不不良资产率将上升3.2个百分点;对政府而言,由此增加的负担相当于建行、中行改制上市的全部花费;对居民而言,大致相当于14%的家庭财产被蒸发。”人们从钟伟的话音里听出来了,他是在力挺房价。

客观地说,尽管模型设计地比较粗糙和简单,但这只是一个关于问题的实证分析,但敏感的媒体和公众无暇也无法区分实证与规范之间的区别。

想成为独立研究的学者,却被人们毫不留情地划入了为富人说话行列。面对种种议论,钟伟平静中难掩情绪:“我给出的是一个定量的结果,但读者阅读的都是极端。不过我现在已经免疫了,“非典”时期我经受的压力更大。”2003年,钟伟写了一篇关于“非典”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文章,提出中国经济当年可以“坐八望九”。而当时国内一些学者增长是零。有人说钟伟是粉饰太平,包括很要好的朋友,还有学术界的严肃学者都对他的研究结果很不理解。

■慕尼黑随笔

天气也成了一张政治经济牌

□梁雨霞

默默无闻的德国北部小城海利根达姆,由于G8会议的召开,前几天突然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这里,德国政治明星默克尔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她的精明。

曾几何时,在这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里,“老欧洲”与美国之间,总有些不爽。不过,在生态与环保方面,欧洲人现在走到了美国人的前面。这对默克尔夫人是个机会,她显然不甘当美国的陪衬,“老欧洲”要的,不是超级大国的附庸地位,而是平等的对话伙伴关系,甚至更多。因此,天气也就成了默克尔夫里的一张牌。

说到天气,美国的确有些先天不足。跟德国相比,美国灾害非常频繁,但仗着幅员辽阔,威震四方,大大咧咧的美国,并不很忧虑能源的匮乏和环境的负担。

举个细小的例子。走进普通人的家庭,美国人不少用的是单层玻璃窗,有不少是老式的材料,密封性差,天气稍微有点热,空调就会终日开着;德国人,尤其是西部,则很注意建筑物物理学的应用,力求通过建筑材料和设计本身,求得冬暖夏凉,许多老建筑都得到了改造,并在持续的改造中,加了保温层,门窗密封性很好,且一般都是双层中空,保温隔热性能良好。

美国的城市规划,往往是设计师的作品,从飞机上往下看,很整

当时钟伟的心情非常沉重,好几天都失眠。“我错在哪里,为什么不看看我的方法,或者我的数据有什么问题呢?”事实最终证明,钟伟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能够享受孤单也是一种境界

钟伟曾在他的一本随笔集《大愚若智》的前言中写过这样的话:“这些经济评论和随笔,是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中,一个渺小的人所记录和观察的生活。我所写的一切将付诸流水,并最终了无痕迹。研究最前沿学术——金融问题的学者,对生活的参透到如此地步,也算活出一种境界来了。但是,他参透生活却并不消极,而是积极投身对社会有更多有意义的研究里。”

而对于这点感悟,钟伟更多认为是因为儿子的降临人间,带给他对生活更加深刻的理解。说来也奇怪,他那个6岁的儿子竟然会面对秋天的落叶发出感言:每一片树叶掉下来,树就打一个哈欠,等树叶落光了,树就睡着了,不知道明年他还会不会再醒来。从这稚嫩的言语,让钟伟大受启发。他在学界撑起的这道独特风景,与他那种不背包袱的人生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熟悉钟伟的人都知道,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他的观点比较激进。他认为金融决定了整个经济的运行,而且是比战争更为惨烈的掠夺手段。所以钟伟极力主张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近年来他还承担了不少政府课题,包括对国际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研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调整的方案设计、对国际发展融资和贫困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领域注定了大众化和商业化,很多都是他和研究伙伴筹集经费自己研究。钟伟笑着说:“研究本身充满乐趣,甚至孤单也可以享受。”

“你可以不同意他对人民币问题的陈述,但绝不能忽略他的观点。”国内一位资深学者这样评论钟伟在金融领域多年不懈的努力,对这样的评说,钟伟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在电脑上操作片刻后说,多年来他写了大概有400多篇谈人民币问题的文章,而有八成始终没有发表。“我的朋友何帆对我说,文章不发表,就发臭,我的电脑是许多文章的诞生地和归宿地。”对“发臭”的文章,他就这么轻描淡写。

虽然参与各种金融政策研究,也并不缺乏成为“体制内”学者的机遇,但钟伟并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台上,他往往思路跳跃,远远超出教科书的刻板,精彩纷呈的同时也枝蔓错杂。有学生评价他的讲课说,“要么你非常喜爱,要么你难以忍受。”

的剑指核心,这从会议的主题“发展与责任”中便可见端倪。

客观地说,美国在天气方面不负责任的形象,多少为中国挡住了不少压力。然而,中国终究有自己的责任。可以预料,天气问题,因为有一些宝贵的缓冲时间,但中国不能再观望了,毕竟,美国并不与中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如果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不远的将来,等待中国的,一定是被迫的重金买单——用以支付欧盟的各种环保节能与新能源技术。

好在2012年之前,“京都协议书”对中国仍然是有利的,还有数年时间,中国不需要承担减排的义务,相反,欧盟的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减排指标,不得不花钱到碳排交易市场上买额度,这给了中国难得的机遇:用别人的钱,解决自己的问题。

实际上,与其等别人投资,制造减排额度出售,中国也可以自己做。碳排放交易利润丰厚,然而,这需要政府给与公共服务方面的支持,否则,国内的有关企业根本不知道如何做起,也很难找到减排额度的买家。

全球化背景下的博弈时代,天气也变成了政治牌,然而,这只是其中一张而已。要判断哪些牌会成为对方的王牌,只需要看别人在什么地方领先,而我们在哪些地方落后。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世界负责。被别人逼着出牌,不如自己采取主动。

只是想做个社会发展的旁观者

钟伟出生在江南小城,5岁时父亲去世,其后家庭陷入困顿。可能是小时候穷困的生活,养成了钟伟有点孤僻的性格。从童年起,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曾经在路边摆个茶摊卖大碗茶,同时租连环画给路人看。赚来的钱全都用来买书。高中之前,他看了很多古典文学典籍。

1987年,钟伟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遭遇哲学思潮,他被尼采、萨特、哈耶克乃至佛洛伊德的学说淹没。毕业时,他自认为对物理“天赋不够”,按他的理解,“物理学是少数高智商的人给我们这些平庸的人诠释世界的游戏”。尽管接下来钟伟从事的是工业自动化、系统工程方面的工作,但他已经开始系统地自学经济学并发表不少学术论文。钟伟说刚开始学习经济学,只是因为喜欢,“它可以解释生活中很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使人更加冷静和理智。对我来说这非常具有趣味性。放弃物理学,是因为学习基础学科很难让人找到像样的工作。出于全面的考虑,就转投了经济学。”

从儿时成为游吟诗人,背着行囊以天为被,以地为家的梦想,到现在成为经济学学者,赖以安身立命的是金融学研究,钟伟形容自己是“半路出家,心有旁骛。”

2003年,钟伟与巴曙松、赵晓等人组成一个虚拟的研究社团“博士咖啡”,他们自称是经济学人的“飘一代”。“这个平台寄托了我们的一点理想。”钟伟说,“我们希望用理性、专业、清晰的声音去看待一些事情。”到现在,博士咖啡中的学者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多,他们穿越半个

北京城聚会,不是挣什么钱,而是为了讨论学术问题。

钟伟发表在博士咖啡上的作品差异性非常大,既有严谨的学术著作,实证的政策报告,也有行文清新的经济评论和随笔。他身上集合了学者的理性和诗人的浪漫。有人将他划入右派,而有人觉得他的观点相当左,而他自己则说不过是以激烈的语言捍卫中庸,中国也许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家,需要的仅仅是我们对经济学常识的足够的尊重。他认为包括他在内的这代经济学家,充其量不过是“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的不合格记录者”。他对自己的定义则是“对经济学知道一鳞半爪,但并不可能对对这个学科有所贡献的旁观者。”

如今,不断地阅读和积累,不断地地孤独思考和写作,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有许多人以为,学经济学是容易风光的事情,其实不然,你必须忍受从早上九点开始到晚上一点钟持续不停地阅读或面对电脑写作的孤寂,我已经忍受了十多年,看来还必须继续忍受下去。”“我和计算机键盘的凝视和对话,远远多于和家人孩子的对话”,说到这里,钟伟多少有些伤感。

除学术研究外,钟伟将相当的精力放到批判不公正的现实生活来,那些尖锐抨击收入不公、关注农民困苦生活状态的短文,往往使他进退两难。不过他对此很泰然:“学者不是巫师,道德水平中等。我的许多判断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但重要的是,要以数据和逻辑让公众理解,你为什么错了。我深深知道我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不呼吁大家相信我。我只是谦卑地认为,那些研究是供有理智的读者参考的文字,喊口号要众人跟随,我永远做不到。”

■本期人物话语



欢迎民企到天津设私募股权基金

戴相龙(天津市长)6月7日在“第三届民营经济发展·天津论坛”上表示,欢迎并愿意推动民营企业在天津滨海新区投资设立私人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私人股权投资在天津滨海新区没有太多的制约,在天津设立类似的基金管理公司是可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并逐步扩大的。

■多声

中央银行没有必要对资产价格变动直接反应

亚当·S·波森(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日前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说,中央银行没有必要对资产价格变动做出直接反应,不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紧缩性货币政策。防止泡沫冲击,最重要的是金融监管而不是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责任是防止通货膨胀和产出急剧波动,由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放松货币与泡沫形成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紧缩货币与阻止泡沫破灭之间也不存在直接联系。所以,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中没有必要对资产价格变动做出直接反应。

中间业务收入是衡量金融创新能力重要指标

唐双宁(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近日在2007年金融创新监管工作会议上说,中间业务收入是衡量金融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他对大中型银行、国内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间业务收入比重提出指导性目标。另外,下一阶段银行业金融创新和监管工作要继续坚持“鼓励与规范并举,培育与防范并重”的指导思想,重点抓好金融衍生产品、理财、电子银行、银行卡、资产证券化和综合

经营等方面的支持、规范和监管工作,按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的要求,坚持鼓励发展、强调规范、服务客户、教育公众,有效指导银行业金融创新和监管工作。

美国经济仍将适度增长

本·伯南克(美联储主席)6月5日通过卫星向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一个国际货币会议发表讲话时指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但从过去四个季度的表现看,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仍平均增长了2%。预计美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接近或略低于这一水平的速度增长。因此,美国经济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适度”增长。

中小企业已成扩大就业主渠道

刘新黔(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6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说,中国中小企业已达4200万户(包括个体工商户),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已经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二是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三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四是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五是中小企业对外开放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经济学术思潮追踪

循环经济学 构画的图景日渐清晰

□梁怡

“循环经济”的思想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Kenneth E. Boulding)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他用“循环其废物(recycle its wastes)”及“循环流(circular-flow)”等词语来描述具有闭路循环特征的世界生态系统上所有元素和人的共生关系,虽没有明确用到“循环经济”一词,但用到了“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他通过“宇宙飞船理论”来描述他的思想,他认为宇宙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其生存是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并不断留下废弃物,到资源最终耗尽而舱内垃圾成堆的时候,飞船也将毁灭;而地球无疑就是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因此,要延长地球寿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实现飞船舱内的资源循环。波尔丁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虽说很可惜未能进一步深入而形成经济学说,但被我国学者认为是循环经济理念的最早倡导者。

成立于意大利罗马的科学家俱乐部——“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影响深远,其第三章专门写资源循环问题。

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Pearce, D.W. & Turner, R.K.) 1990年第一次使用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一词。这两位学者合著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的第二章标题就是“循环经济(the Circular Economy)”。他们试图依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资源管理规则,并建立物质流动模型。皮尔斯提出了自然资源管理的两个规则:一是可再生资源的开采率不大于其可再生速率;二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废物流量要小于或等于环境的同化能力。针对资源存量的特点,两位学者还提出:可耗竭资源减少应当由可再生资源的增加来补偿(可持续性);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标准,就要减少可耗竭资源或可再生资源存量(提高效率)。他们认为类似于工业代谢,循环经济模型由自然循环和工业循环组成,这两种循环都为再生产提供原料。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往后,循环经济知识与经济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研究的两大主题,而对知识经济的研究更是赋予循环经济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继英文术语“Circular Economy”之后,西方学者又陆续创造出了“Recycling Economy”、“Circling Economy”、“Circular Economy”和“Recycle Economy”等术语以求更准确的表达和界定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定义。

现在,世人逐渐达成共识:循环经济是研究人类按生态学规律展开经济活动的一门科学,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为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是新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增长模式的区别在于: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地球仅被当作资源库和排污场,其资源获取与废物排除方式表现为“资源—产品—废弃”,因而是线性的增长模式;而循环经济要求在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循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提高资源利用率,按生物规律延伸产业链,以“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为表现形式,因而是集约化的增长模式。

当然,提到循环经济理念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人们不能不关注中国及中国学者的贡献。

中国经济最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中国怎样在资源、产品和规模上都保持了超过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工业化的惊人速度,而今后又将如何继续保持。在这一问题中,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科技进步是最重要的内容,其研究结果便是中国对经济学创新的主要贡献。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3R(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为指导原则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学者吴季松以3R为基础提出的5R原则,于2005年在世界“思想者节日论坛”上首次全面提出,随即得到与会学者一致认同。5R原则即再思考(rethink)、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和再修复(repair),它的贡献在于增加了再思考(rethink)和再修复(repair)的新理念。

中国学者谭根林经过8年的研究探索,采用独特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循环经济学体系。他把循环经济学定义为:循环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循环运动的科学,人的经济循环运动指的是人不断将环境要素转换为产品,将产品分配给不同的人,产品不断退化为环境要素的过程。他认为,人的经济循环运动可以分解为产品的循环运动和货币的循环运动。

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的最终追求目标,是使全社会的生产系统向生态系统一样实现全封闭循环运行,最终获得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对循环经济的研究虽仍然属于起步阶段,但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当今社会的生产技术水平、知识结构、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世界正在朝着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而循环经济构画的美好图景也越来越清晰。